

马街书会起源浅说 (上)

□ 韩志强

杨庄镇马街村东三余里应河岸边有一座火神庙。自古以来,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一到正月十三,特别是正月十三当日,有众多的说书艺人负鼓携琴,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,在火神庙旁的田野里调弦弄管、展场亮艺——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农历正月十三马街书会。

马街书会是何时形成的,她又有着怎样的神奇魅力,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说书艺人年复一年朝圣般齐聚一地赶会亮艺?一直以来,在我县及周边地区,流传着许多有关马街书会的神话般传说。

一、马街书会“十说”辨析

有关书会的起因众说不一,归纳起来,主要传说有悼师、禳灾、颂德、还愿、会艺、除恶、祭祖、祈雨、度荒、皇恩等10余种。但传说毕竟是传说,细究起来,漏洞百出,经不起推敲。

(一)“颂德说”“会艺说”的谬误。“十说”中的颂德说和会艺说对应的是应国大夫张舒。据说张舒琴技高超,喜爱弹唱,有弟子数百人,艺友不计其数,四海之内皆有知音。又传张舒乐善好施,矜贫救厄,治理应河水患,深受乡人敬爱,后高年死于正月十三。后人为缅怀其恩德,每年此日涌至墓前祭拜,其弟子与天下艺友也致哀献艺。彼时,应水河畔,火神庙前,游人如织,数日不断,日久天长遂成马街书会。但应国时期距今已有3000年历史,彼时有否马街村落亦未可知,况且应国所处的西周属奴隶社会,等级制度森严,士大夫不可能与平民一起共乐。应国于公元前723年被郑国灭后,并未留下史料,史书对应国的记载也寥寥无几,那么,应国大夫张舒从何而来?

(二)“皇恩说”中的历史问题。“东汉中兴前夕,昆阳之战期间,王莽撵刘秀至此,汉军得以抢渡应水,转败为胜……为嘉奖战难时乡民艺人相助之举”云云,“以救驾之日为会期,年年起会,感念皇恩,延续至今。”

昆阳之战发生在新莽地皇四年,淮阳王刘玄大更始元年(公元23年)六月,而马街东三里应河火神庙正月十三会期与昆阳之战时差半年之久。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云:

更始元年三月,光武别与诸将徇昆阳、定陵(今北舞渡)、郾,皆下之,多得牛马财物,谷数十万斛,转以馈宛下。……遣大司徒王寻、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,其甲士四十二万人,五月到颍川(许昌、禹州一带)复与严尤、陈茂合。……光武将数千兵檄之于阳关(地名:阳关聚在颍水东南,地在洛州阳翟县西北),诸将见寻邑兵盛,反走驰入昆阳。……(莽军)遂围(昆阳城)之数重……六月己卯,光武遂与营部俱进,自将步、骑千余,前去大军四、五里而陈。……光武复进,寻、邑兵却。诸部共乘之,斩首数百级,连胜,遂前。……诸将既经累捷,胆气益壮,无不以一当百。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,寻、邑阵乱,弃锐崩之,遂杀王寻。城中亦鼓噪而出,

中外和执,震呼动天地。莽兵大溃。走者相腾践,奔殪百余里间。会大风雨,屋瓦皆非,雨下如注,潢川盛溢,虎豹皆股战,士卒争赴,溺死者以万数,水为之不流。王邑、严尤、陈茂轻骑乘死人渡(潢)水逃去。

据此看来,不仅时间上对不上,且汉光武帝刘秀当时的活动范围,主要在昆阳、定陵、郾城以及颍川等地,并未涉及潢水上游的应水一带,因而正月十三刘秀渡应水、马街村民救驾之事应属讹传。

(三)“禳灾说”“祈雨说”的神秘色彩。“禳灾说”。古代应河常泛滥成灾,人们认为是黑龙潭的妖怪所致,就在河边建一座火神庙。因火神生日是正月初七,每年正月初七前来朝拜者众多,家家户户、男女老幼都来给火神爷烧香上供磕头。后来不少说书艺人也来卖唱,久而成书会。

但是,穰水灾是应该拜水神的,比如

荒,必是避灾趋丰,说书艺人纵不会选择正月十三这个特定的日子,不辞辛苦地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;“祭祖说”是说马街村一位大鼓书艺人过世后,其弟子年复一年前来祭拜形成庙会。但问题是,河南大鼓书是在山东大鼓的影响下形成于清末民初,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,而马街书会在此前就早已存在,实难为信。

凡此种种,不多赘述。

二、马街书会始于元代缺乏必要的政治和社会根基

“十说”中有一定分量的当属“悼师说”了。河南省曲协的任骋、马凌怡在1988年撰写的《十三马街会初考》中谈道:马德平属开天辟地第二辈,死于正月十三。徒子徒孙们年复一年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唱戏祭拜,马街会就越闹越大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河南省曲协的马

所聚之地曰马渡店,中有古寺曰广严禅寺,实创于宋(应为元)延祐二年(1315年)向后废兴者几……”

这就牵扯到两个问题,一是在元代统治阶级对中原地区的严酷统治下,民间说唱艺术是否有生存的空间;二是《重修广严禅寺碑记》是不是马街书会溯源的重要依据。

长期从事曲艺史研究的上海戏剧学院教授、曲艺理论家陈汝衡,在其著作《说书史话》中有这样的阐述:

蒙元统治阶级为了镇压汉民族的反抗,就建立了广编的驻兵区,据记载,在江南三行省里便有六十三处驻兵区。其他军事要冲之地,如河洛、山东一带所驻的全是嫡系蒙古军。所有民间马匹武器都被强迫交给政府,否则要受到严厉的刑罚。在戒严期间,夜里不许通行,禁止点灯……元代的吏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吏治。

蒙元统治者极度害怕汉族民众的团结反抗,因此也害怕与其中密切相关的说书艺人。因为在说书场合里可聚集市民阶层,而唱说民间故事,可产生对统治阶级的反抗的煽动性效果。因此,元蒙统治阶级对说书艺人采取压迫、禁止、摧残的严酷手段进行禁止。

《元史》卷一〇五《刑法志》第五十三条“刑法”云:“诸民间子弟,不务生业,辄于城市坊镇,演唱词话,教习杂戏,聚众淫虐,并禁治之。”

元《通制条格》卷二十七《搬词》条说:“至元十年(1274)十一月,中书省大司农呈:河南、河北道巡行劝农官申;顺天路束鹿县镇头店聚约百人,搬唱词话,社长田秀等约,量断罪外,本司看详;除采籍正式乐人外,其余农人、市户、良家子弟,若有不务正业习学散乐、搬唱词话,并行禁约,都省准呈。”

又《元典章》五十七《刑部》十九“杂禁”条云:“在都唱唱琵琶词话郎儿人等,聚集人众,充塞街市,男女相混,不唯印惹斗讼,又恐别生事端;蒙都堂议得,拟令禁断,送部行下合属,依上禁行。”

《元典章》四十一《刑部三:谋反乱言平民作歹》条载,元武宗至大三年,有回回农民木八刺,因贪图官赏,告发汉族说书艺人讲唱说“达达家(蒙古)统治将终,赵官家来治国”的“幼小听得妄传词话。”栽赃陷害汉人。元蒙统治阶级借助政治力量和残酷的禁令,禁止汉族说书艺人在民间的说唱活动,使许多说书艺人和词话作品遭到打压和禁止。

查阅《河南地方史志编纂手册》中国历代人口统计与河南省人口比例一节,以元代为基点对比其前宋后明两朝,不难看出,元代河南省人口数字达到了历史最低点。比如:宋徽宗崇宁元年(1102)河南为288万,而到了元代至元27年(1291)猛减到81万,到明洪武十四年又增加到了189万。这些数字也说明了元代统治的异常严酷。

综上,由于没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祥和的社会环境,马街书会起始于元代的说法也很欠妥。

(未完待续)



资料图

中华曲艺展览馆前司士选铜钱妙计雕塑

司士选,宝丰马渡街人。清嘉庆至光绪年间官选涪川县训导,继升任南阳府教谕。告老还乡后,酷爱文艺,被乡里推举为“十三马街书会”会首。他任会首期间,善举措、兴书会,力倡村民盛待艺人。同治二年(1863年)赶会艺人很多,村民为赶会艺人多少打赌,输赢难定。司会首计上心头,令人在火神庙香案前放一大斗,让赶会艺人都到火神庙进香火钱,每人只许投一枚铜钱入斗。会后,数数为两串七百钱,说明当年赶会艺人为二千七百人。司会首巧用“铜钱入斗法”妙算赶会艺人的故事流传至今。如今,该故事以群雕的形式在中华曲艺展览馆前展出。

魏文侯时西门豹治邺,又比如长江两岸的人们祭拜龙王,沿黄河的人们祭拜河神。拜河神、建塔避河妖是旧时人们面对水灾的无奈之举,与火神有何相干?历史上建火神庙的多半是基于对火的畏惧。过去的建筑多半是木结构,极易遭受火灾,建火神庙就是希望得到火神庇佑。马街火神庙存《修葺火神庙碑记》云:“人无不赖火以利用。斯火之功于历代有济于民生者……”火神即民之福神。

“祈雨说”更是无稽之谈。当时马街及周边民众祈雨之地在鲁山县蛮流村的龙王庙,哪有在火神庙向火神求雨之理。

其余几说内容与“禳灾说”和“祈雨说”基本相似。比如“还愿说”,说的是马街村内一家大户为避灾祈福,于正月十三写书还愿;“除恶说”出自鲁山县作者樊广志虚构于《马街书会演义》中的神话故事;“渡荒说”是讲艺人们在荒年为渡饥荒聚而成会。可是,马街书会无论丰年灾年皆如常举行,从未间断。若说渡

街书会调查报告中说,马德平在三皇会中为“德”字辈,排行第二,辈数最高。2016年宝丰县文化广电局主编的《宝丰文化志》也说,马街书会缘于元朝中期马街三弦书艺人马德平仙逝,“徒弟们都来悼念他,并许下愿,每年这一天来纪念他,唱一天书。这样年复一年,相沿成习,遂成传统的马街书会。”

另据1996年版《宝丰县志·文化篇》载:“马街书会,俗称十三马街书会。在县城南马街村举行……据马街村广严寺及火神庙碑刻记载,此会源于元延祐年间(1316),迄今已近700年。”《宝丰县志》“宝丰文化现象”篇说:据明弘治九年(1496)《重修广严禅寺碑记》载:该寺“实创始于宋(应为元)延祐二年,向后废而复兴者几……有庙就有会,书会随庙会而生则顺其自然。因此,可以断定,马街书会起始不迟于元代。”《宝丰文化志》亦说:“据明弘治九年(1496)《重修广严禅寺碑记》记载:宝丰县治南十里,有居民